

张信刚 著

尼罗河畔随想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267

586

2007

张信刚 著

尼罗河畔随想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罗河畔随想 / 张信刚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4

ISBN 978-7-108-02708-5

I. 尼… II. 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7242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我出生于伪满时期的沈阳，启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济南，成长于蒋介石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成家于民权运动高涨的美国加州湾区，立业于越战时期的美国纽约州。

1976年夏，举家迁往主办奥运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不久魁北克党人入主省政府，独立运动风起云涌。1984年，加州洛杉矶主办奥运，我再举家迁往该地就职于南加州大学。1990年，我以“知天命”之年，跟随内心的呼唤到香港工作，开始了回归旅程。

五岁时，父亲领着我上街，欢迎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接收济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十岁时，父亲为我买了几套少年读物，包括民族英雄及世界名人传记，世界奇观等，令我眼界顿开。父亲是外科医生，但对地理、历史及民族学都有相当的认识，因此也启发了我在这几方面的兴趣。

二十三岁赴美留学时，由于家父母在东非古国埃塞俄比亚工作，我有机会游历亚、非、欧三洲，第一次见到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也使我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有了初步的体认。由于青年时代这一经历，我在日后三十年从事生物医学工程事业的生涯中，持续保持对人文社会的关注。

在香港任职十几年来，对香港定位、高等教育、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世界文明进程等问题做了较多的探索，写了不少文字。现在选出三十篇，结集出版，作为个人心路历程的记载。以《尼罗河畔随想》为书名，是因为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的个人际遇、历史认知与教育理念，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联书店的李昕先生热心支持本书出版，徐国强先生仔细编辑并提出不少建议。我在此表示感谢。

付梓在即，有些惶恐，不知读者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与体裁均很混杂的文字。但所能向读者申明的，就是这些文字全都是我自身经历与内心世界的忠实反映。

1989年秋，当我向退休后定居于美国加州的家父母禀告我准备到香港工作时，家父沉吟片刻后说：“你有机会为自己的同胞贡献所学，是好事。”这一鼓励十几年来给予我极大的力量。现在，我以虔敬之情，将本书献给先父在天之灵。

作者

2007年3月

目 录

心怀今古	1
九八随想	3
历史与文化之旅	9
从活字版到万维网	18
千禧年、千年虫与文化交流	26
新世纪随想	31
《英雄》、“天下”与“天下为公”	36
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	41
四时读书乐	48
目及八荒	53
塞纳河畔随想	55
恒河流域随想	81
尼罗河畔随想	93
波斯普鲁斯海峡随想	100
与法国有缘	115

埃及的“稀客”	122
长铗有识	127
论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世界态势	129
我的心灵之旅——由《哈吉巴巴历险记》到《我的名字叫红》	142
了解伊斯兰教及社会发展	155
从 SARS 看人生与社会	161
翡冷翠、光电子与神经网络	168
襄阳向洛阳	177
香港学生的文化认同	184
短笛无腔	189
风华正茂时，悠然见南山	191
求知的“美好新世界”	208
文化素质与创意工业	215
从利玛窦到北京申奥	227

如此古老，如此现代	237
快乐与成就	243
让昨天与明天相遇在今天	252
八千里路云和月	27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94

心
怀
今
古

九八随想

十多年来，“97”这个数字似乎成了令人们担忧的同义语。不知多少海外朋友问过我：“What’s going to happen after 1997?” 我的答案总是：“1998。”

现在香港已经顺利回归，1998年真的来临了。但是人们仍然忧心忡忡。谁曾料到，1997年下半年会有一场亚洲金融风暴？谁又想到会出现禽流感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政府公信力问题？

1998年之后，香港以及全中国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是预言家，但是我相信历史。要洞悉明日，一定要通晓昨日。

且让时光倒退五百年。

1498年正当明朝中叶，是孝宗弘治十一年。全国人口大约是一亿五千万。孝宗提倡储粮养民，所以百姓的生活算得小康。自宋朝以来逐渐发达的城市工商业，为这个以农立国的社会增添了新的色彩。当时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已然高度发达。印刷术、丝织品、瓷器举世无双。医药、建筑、造船、采矿也十分高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一年正式成集出版。王阳明则在这一年中进士。

1498年的欧洲也逐渐从“黑暗时代”的千年梦魇中苏醒。由地中海贸易所带动的城市经济极为活跃。整个欧洲都在意大利的前导下准备欢

庆“再生”(Renaissance)。这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1498年，达·芬奇(da Vinci)刚在米兰完成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年轻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于此年开始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雕塑《圣母的哀怜》(Pieta)。这一年，二十九岁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参加佛罗伦萨城邦政府工作，开始为他日后的名著《君主论》(The Prince)累积材料。英国的培根(Bacon)、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波兰的哥白尼(Copernicus)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中各树一帜。

对全人类最具影响的，当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1498这一年，达·伽马(da Gama)首次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西岸。同一年，哥伦布(Columbus)第三次扬帆驶往美洲。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地球村，那么全人类从1498年起，就只有一部共同的历史。

1598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刊行八年之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离开他居住了十五年的广东，前往北京。三年后，他得以觐谒神宗万历皇帝，呈上了一张《坤輿万国全图》，并献自鸣钟、钢琴等物。万历对这些礼品有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中西文化开始了历时四百年的相互冲击与影响，至今未止。

利玛窦出发赴北京时，文艺复兴之风已经吹遍欧洲。英国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1564—1616)，到这一年已经写了二十种剧本。

再过一百年，即1698年，清圣祖康熙三征准噶尔，大体定下今日中国的版图。他以满族入主中原，倡儒教，重科举，因而赢得了汉族地主官绅阶级的拥护。此时，中国的农业与商业都较前大有进步，工艺技术也日新月异。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一书，共十一卷，详载了当时的各

类工艺，蔚然大观。

虽然明清以来的城市经济与文化十分蓬勃，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或许因为千年以来形成的地主官绅阶级过于强大，中国社会遂成为一个“超稳定结构”。城市工商阶级虽然出现却无法成为坚实的社会力量。商人要托庇于官吏之下，致富之后，多是置田产，令子弟读书为官，加入地主官绅的行列。他们不像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有产者那样，在获得经济力量之后，挑战贵族甚至皇权，进而取得政治上的支配权。

殖民地为欧洲带来了大量黄金白银，增加了货币流通，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到1698年，英国“光荣革命”已经成功，议会取得了权力。这一年，它通过法案，承认贩卖奴隶为合法。

中国无法应付欧洲的挑战

1798年，“十全老人”乾隆已退休了。这时全国人口大约是四亿，土地不敷使用，社会上乱象已呈。另一方面，工商业与手工业益加发达，手工作坊大量增加，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与此同时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不是完全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然而，新兴工业毕竟没有出现，“超稳定结构”却受到了其他因素的挑战。白莲教乱，暴露了清王朝的弱点：“文官要钱，武官怕死。”吸食鸦片在民间日渐普遍，大量白银开始外流。可流通的货币因之锐减，限制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朝中大臣的自大无知，令中国无法对来自欧洲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回应。踏入19世纪，中外关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欧洲知识分子几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已被商人与传教士的轻蔑所取代。

在欧洲，新近进入工业时代的英、法两国正在争夺霸权。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奏凯，但海军却又败于纳尔逊（Nelson，1756—1805）。

数年后，纳尔逊率领英国舰队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一役，大胜法国与西班牙，开创了英国一百年海上无敌的局面。

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崭露头角，朝气蓬勃，正准备进入古老中国不情愿地登上但又退不下来的世界舞台。

中国工业化迟到两百年

19世纪末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心痛的年代。政府无能，经济停滞，社会落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了家常便饭。

1898年，中国几遭瓜分。俄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强租胶州湾（包括青岛）；法国强租广州湾。连不够力量的意大利都想强租浙江三门湾！英国一向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这一年，又强租了山东威海卫及“九龙新界”，租期九十九年。1997之所以有重要性，盖源于此。

1898年，中国也出现了重大契机。大批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倡议维新。他们说服光绪皇帝变法图存。光绪采用了维新派的所有主张，于一百天内，连下近二百道诏书和谕旨，实行新制。结果遭到保守势力反扑，“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再度主政，尽废新法。只有一条保存了下来，那就是设立京师大学堂。无论维新派还是保守派都认识到，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训练出一批具有新知识的人才。学堂于1912年易名北京大学，今年正值百年校庆。

“百日维新”失败后，孙中山以降的几代爱国者，不断找寻振兴民族之道。这期间，作为最早接触西方思潮的广东与香港，起了相当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他们的许多追随者，都是广东人，实非偶然。

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打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根本谈不到经济建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才以国家力量主导，进行了工业化。这条工业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人民为之付出相当大的

代价。但是，它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与人力基础。同一时期，香港与台湾也分别进行了工业化。与英国、法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来迟了两百年；与美、德、日等国相比，也晚了一百年。

实现数代人追求的目标

经历了自 1898 年到 1978 年整整八十年不停的动荡之后，一个面貌崭新的中国重现于 20 世纪末的世界舞台上。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实行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迅速地提高了综合国力。香港因此直接受益，而有今天的富裕与发展机会。

中西文化经过四百年的碰撞与交融，中国先强后弱，又由弱转强。自 1898 年维新变法以来，数代人所追求的目标，到了 1998 年的今天才有了真正实现的机会。如果说 1898 年是中国国运的渊底，相信全世界有识之士都会同意，1998 年应是我们准备再登高峰的前夕。中华民族在过去两百年内，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有理由自信与乐观。

不能影响教育的百年大计

今天，人类已从“工业社会”进入了“知识社会”。21 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世界。无论是为了香港本身还是整个国家，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放松人才的培养。无论目前的金融危机持续多久及有多严重，它对历史总趋势来说，都只能是短暂的和局部的波折。我们万万不能让短期的经济不景气影响到我们对百年大计——教育的重视。

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既为下一个世纪民族振兴的机缘而兴奋，也为我们当前教育领域中的欠缺而焦虑。乾隆时代没能及时工业化，全民族为之受苦两百年。在人类已由土地、原料及劳动力的竞

赛转为知识与资讯的竞赛之际，香港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并为全国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善现行的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青年面对共同挑战

明天是否真正会更好，要看我们今天如何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让所有体智健全的年轻人都能接受可以适应下一个世纪的现代化教育。他们都应该掌握现代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并以作中国公民而自豪。在这一点上，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既有着共同的命运，也面对共同的挑战。

1898年，当我们的民族处于最痛苦的深渊时，全国朝野上下能有一个创设新式学堂培养新人才的共识。1998年，到了民族全面振兴的前夕，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十分明显的。

(连载于《信报》1998年2月2日、3日)

历史与文化之旅

这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的情况。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也是今天全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全球最多的人口。在 21 世纪里，这两个国家能否友好相处，合作互惠，实在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

克林顿抵华访问的第一站是西安，中国以古礼安排入城仪式。选择以西安为访问行程的开始，实在非常有意义。西安（古称长安）自秦汉以来曾经十二次作为都城，也是古时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中心。访问中国而不到西安，就很难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一个感性的认识。

以黄河中游为源起的华夏文化，通过长时期以来与东夷与苗蛮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相互渗透，逐渐发展成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更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往中，吸收养分，保持并增加了它旺盛的生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曾经有过两次长时间与大规模的接触。

晋唐之间，因为佛教的传入而与西域及印度文化的交流应为最重要的第一次。